

信義書房漫話之四

海內外的檔案館

吳相湘

個人及公務文獻檔案，具有直接的特性和法律效用，是認識事實演變因果、判斷是非曲直的權威記錄，也是編纂各種圖書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因此，古今中外各國都注意保存檔案，並在一定時限以後公開讓大眾閱覽。

我曾在北平、南京、臺灣、華府、倫敦、東京、漢城、星洲各地的檔案館研讀，發現許多珍貴資料，解答若干問題。尤其外國檔案館的工作方法及服務態度更給予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我第一次走入北平紫禁城，參觀故宮博物院。莊嚴的殿陛、宏偉的宮室、精緻的陳設、珍貴的古玩，每一樣事物都使我驚奇，嘆為觀止。寧壽宮內一座高八尺寬厚六尺的立體玉彫大禹治水圖、慈禧太后御用衣飾用品、雍正帝硃批年羹堯奏摺、乾隆帝硃筆增刪「英國貢使來朝」上諭等文物，更引起我非常興趣。因為我在中學時代讀過「乾隆英使覲見記」、「慈禧外紀」以及甘鳳池、呂四娘的掌故和小說，如今居然看到了原始的歷史文獻。從此每逢周末假日，故宮博物院就是我去常去的地方。

民國二十五年春，先師孟心史（森）教授為撰「香妃考實」，命我前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去檢尋有關史料

諭在廷三大臣等同着朕奉兩宮
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據奏書祺奏恭
親王辦事徇情貪墨多摺物議種種情形
等弊嗣此重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
實據是出有因究屬賄賂知事難以懲辦
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放
以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着朕沖齡諸多
挾致往來諸始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
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品此情形
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早宣示朕歸
政之時何以能用人才正嗣此德重天
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
着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
准干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藏院物博宮故) 諭硃王親恭免罷書手筆親禧慈年四治同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整理史料機關，並親手接觸到三百餘年前曾經「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乾隆帝硃批的文獻。當時文獻館是利用清朝宮庭房舍，陳設家具也都是前朝遺留，我坐在紫檀木製書桌前檢閱這些文件，尤

其翻閱原供御覽的大黃綾本實錄（黃緞包袱）時，真有時光倒流到三百年前中國極盛時代的感覺。雖然不敢有「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帝皇思想，無論如何，企盼三五年後能在這樣環境裏工作的念頭却油然而生。

民國二十六年夏，我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孟心史師命我到北大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擔任助理，傅孟真師命我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也是整理明清史料。因為內閣大庫檔案一部份撥給北大，一部份歸屬中央研究院。兩處工作性質相同，又都是業師命令；我不便有所選擇。最後歷史學系主任姚從吾師協調：我接受中央研究院的職位，但仍留居北大在孟心史師指導下工作。

不幸，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在盧

溝橋頭的炮火破壞了中國人的一切美好計劃。我個人的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經過八年的苦戰，日本終於被迫無條件投降，我們開始從頭收拾舊山河。民國三十六年多，我重遊北平，欣見文化古都大體無恙，紫禁城景色如舊，玉質大禹治水圖和許多文獻，也陳列在寧壽宮裏，觸景生情，又使我有重溫舊夢的念頭。

民國三十七年春，姚從吾師應聘為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他老知我對整理檔案的興趣，向院長馬叔平（衡）師推薦聘我為編纂。是年九月，我自上海乘海輪到天津轉北平報到。全院同仁大多是北大學長，對我特別照顧，尤以在文獻館工作多年的單士魁學長給予指導最多——我因多年夢想成為事實，好奇求知心非常旺盛，士魁兄更不厭其煩的詳細解答我的問題。

庚子軍務檔及莊親王奏摺

紫禁城原是明清帝皇朝會、辦事、居住所在。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後，清宣統帝沒有按照優待條件遷居頤和園，仍舊在宮庭內作小皇帝，並且繼續沿用宣統年號；但紫禁城却已被劃為三部份了。

紫禁城前部的端門以迄午門，居天安門內，位於北平市中部，為故都最大的建築物，民國七年七月，經教育部設立歷史博物館。端門以內的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原是禁城「外朝」的處所，早在民國三年即由內政部設立古物陳列所，將熱河避暑山莊及奉天盛京（遼寧瀋陽）故宮的古玩陳設運來展覽。而在保和殿後、乾清門前築一牆垣區分內外：宣統帝仍安居「內廷」，由紫禁城後門——神武門出入。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用兵力「逼宮」，宣統帝被迫移出紫禁城，取消帝號。六日，代理國務總理黃郛公佈：開放紫禁城宮庭備充國立博物院之用。民國十四年十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從此，這一具有五百餘年神秘意味的帝皇「三宮六院」遂公開於世。

故宮博物院分設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利用禁城內廷原有宮殿房屋作為陳列、展覽、收藏、辦公的處所。例如奉先殿、齋宮、毓慶宮及東六宮劃屬古物館，壽安宮、英華殿各處劃屬圖書館，寧壽宮各宮殿劃屬文獻館。這些宮室大多數都有歷史上的價值，今闢作陳列展覽，光線及其他設備雖不符合現代博物館的標準，却容易引發參觀人的思古幽情，置身其間有時光倒流「參與」的感覺。我對於故宮博物院特別喜愛原因在此。如今臺北市外雙溪中山博物院一切設備現代化，故宮文物陳列其中，我總有不調和的感覺。同樣的：我對美國各大博物院及倫敦大英博物院也有此感，而巴黎郊外凡爾塞宮內部空空如也，祇有使參觀人仰視天花板上的彩繪！也和故宮博物院的情調大異其趣。

民國三十七年秋，我在故宮文獻館工作時，研究室即清宣統朝攝政王治事之所：也就是四合院南部的三開間房屋，深秋初冬時際已掛上墊棉門簾，室內家具全是紫檀木製，坐在太師椅上檢閱若干原供御覽的密件，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何況就史源學觀點這些文獻正是第一手原料！

故宮原是明清兩代帝皇的「家」，經歷五百餘年，各處宮室堆置累積的文物繁多，從來沒有詳細清冊，更未曾做過點查工作，太監利用機會偷竊事件常見記載。宣統帝在民國初年居留宮禁時，古物被竊更時有所聞。故宮博物院成立後，院長易培基及秘書長李宗侗等就利用這一片糊塗帳而監守自盜，成為喧騰中外的「故宮盜寶案」。幸而他們注重珍貴的古物及圖書，對於文獻館的文物還沒有措意。

民國二十二年夏，故宮重要藏品避寇南運上海南京保存，其中也有若干文獻史料，但北平宮中存留仍數量衆多，文獻館同仁一方面積極進行分類編製卡片，同時又在各處堆積物品中陸續發現許多重要文件。抗戰八年中工作未曾停頓，因此，民國三十七年秋我到文獻館時大飽眼福。

我在戰前曾撰「咸豐辛酉政變紀要」，記述一八六〇年慈禧奪取政權的經過，現在身在「寶山」更企圖多發掘「老佛爺」的最高秘密。在文獻館同仁熱心協助下，我終於看到了一些密件——慈禧自取得最高統治權後，為掩飾本身的乖誤，經常傳旨將有關諭旨奏摺自「起居注」中撤除，就是不要留下歷史記錄。但負責起居注

的官員並不將這些諭摺銷燬，而是另立一檔以便查考。例如義和團亂是慈禧一生最大錯誤，清德宗（光緒帝）實錄本紀中都祇有簡單記載；今幸文獻館同仁在宮中發現「庚子軍務檔」一冊，其中抄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歲即西曆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日以後各種有關義和團的諭旨，正是「實錄」諸書所不載，更是中外記述義和團事件所不詳甚至以訛傳訛的。例如是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發佈對世界各國宣戰詔書，是慈禧荒謬絕倫的重大措施，當時無人能諫阻，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以後，慈禧才被迫低頭，且下令撤除有關義和團諭旨，但中外書刊以訛傳訛，莫衷一是。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刊行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於此「宣戰詔」比對各家記載後，自以為其書所引錄的「較為忠實」。然而我以「庚子軍務檔」所載「宣戰詔」相互校對，兩者之間至少有八處重要差異。足見清宮檔冊原始記載比較坊間書籍內容要符合事實真相。至於重要事件發生時日，「庚子軍務檔」可以糾正諸書錯誤的地方甚多。何況，在這一「庚子軍務檔」以外還有更多的原始密摺，如今也陸續發現並經編目。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是依清宮舊例將「宮中檔」、「軍機處檔」、「內務府檔」等原屬「內廷」文件存放寧壽宮附近辦公處，也就是我每日「二進宮」辦公的地方，隨時可查閱。至於原屬「外朝」即內閣處理的文件仍存內閣，北大學長單士魁兄在那裏主持整理工作，我也曾經前往查閱目錄卡片，發現一份非常重要文獻，即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欽命統率義和團王大臣」莊親王載勛咨內閣公文，粘附六月初四日上奏經慈禧御覽的布置義和團大概情形摺，其中有云：「伏思義和團之興，雖由神道，實出輿情。奴才等受命統率……惟有因民之所欲，寓以兵法部勒之……現集之團計有數萬之衆，刻經設法拊循，幸均就範，當飭該團等隨同官兵，先行剿滅住京洋館，一俟洋館肅清後，再由奴才等妥籌良策，奏明辦理」。這是慈禧命令步軍統領莊親王載勛統率義和團隨同官軍攻擊北京城內各國公使館的原始官方文件，幸而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沒有被洋人發現搜獲，否則，要脅的條款更要苛刻！

我曾經拿這一文件和有關各書比對：許多書籍不祇不知莊親王奉懿旨攻擊各國使館的事，甚至對「欽命統

率義和團王大臣」職稱也記載錯誤。至於載勛擬訂統率義和團四條更不是行世諸書所能「知道了」！

這一例證說明：原始檔案遠比一般書籍接近事實真相，更能表露一般書籍所不詳的事實——自故宮博物院刊行「史料旬刊」、「文獻叢編」公開宮中若干檔案後，史學家已可將清朝官私書籍中若干有關記載加以糾正並且重寫，雍正帝即位的秘密也被揭穿了。但衆多的檔案仍有待學人發掘研究。

老佛爺手詔錯字連篇

近一百二十年來，是中國外患內憂最亟的時際，更是歷史大轉變的重要關頭。不幸，慈禧太后却手握政柄四十七年，她不僅沒有近代知識，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所知甚少，而予智予雄，充分發揮頑固守舊自私殘酷的專制政治的特色，自然難以面對空前的大變局。同治四年三月（西曆一八六五年四月）罷黜恭親王奕訢（名畫家溥儒的祖父）一切差使，不准他與聞政事。從此，慈禧許多變本加厲的錯誤措施更層出不窮。

我早自同治帝師傅翁同龢日記得知：慈禧罷黜恭親王詔是親筆手寫，向軍機大臣等宣佈時曾說：「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辭句不通者，汝等爲潤飾之」。而「史料旬刊」、「文獻叢編」却沒有刊載過原文。「是不是已被慈禧撕毀了呢」？我心中時常有這一疑問。但當我在文獻館工作時竟出乎意料地發現了這一詔旨原件，是用硃筆寫在宣紙上，內容確如翁同龢日記所記載「有別字及辭句不通」的地方（附圖）。由這一手筆，「老佛爺」的學識如何？世人今有原始資料可作論斷了。（世上流傳慈禧御筆都是文學侍從之臣代筆，她的山水畫也是繆素筠奶奶代筆）。

由於這一手詔的發現，我更努力追尋老佛爺的秘密。民國三十七年多，北平局勢變化，我被迫南下。獲得故宮文獻館駐守南京倉庫的歐陽道達學長的格外協助，在時局緊張中仍允許我尋查存放南京的宮中密檔，又有許多重要發現，使拙撰「晚清宮庭實紀」內容更加充實。

當我在北平故宮尋找慈禧秘密時，更希望能發現與德菱女士「清宮二年記」及卡爾女士「慈禧寫照記」諸書有關資料。很幸運的我居然看到御膳房檔案！

「清宮二年記」誇說宮廷飲宴每餐多至一百餘品，但就膳檔看來却沒有這樣多。德菱女士又說光緒帝遭虐待，飲食多腐壞不堪入口。然而御膳房却有專檔記載：光緒帝嗜愛火腿！慈禧日常用膳最多不過十餘品，年節大宴包括水果蜜餞點心共計九十九品。因為「九」在數字中是最大的，中國習俗所謂九九添籌九如吉祥等都是此意。超過九祇是零的增加了。德菱女士記載實在是耳代目的妄語。今鈔錄一八六〇年慈禧掌握政權後第一次壽宴菜單如下，以見一斑：火鍋二品：羊肉炖豆腐、爐鴨炖白菜。大碗菜四品：燕窩（福）字鍋燒鴨子、燕窩（壽）字鍋燒鴨子、燕窩（萬）字紅白鴨子、燕窩（年）字十錦攪絲。中碗菜四品：燕窩肥鷄絲、溜鮮蝦、膾鴨腰、三鮮鴿蛋。碟菜六品：燕窩炒燻鷄絲、肉絲炒翅子、口蘑炒鷄片、溜野鴨丸子、果子醬、碎溜鷄。片盤二品：掛爐鴨子、掛爐豬。餽餽四品：白糖油糕壽意、苜蓿糕壽意、五福捧壽桃、百壽桃。銀碟小菜四品：燕窩鴨條湯、鷄絲麵、老米膳、果子粥。如今一百一十餘年過去了，中國飲膳菜色的「名」「實」仍多與這菜單大同小異。這大概就是固守傳統的一例證（就膳檔知：乾隆帝也愛吃紅白鴨子，又乾隆帝御用金匙松石紐共重二兩三錢。慈禧御用金匙重三兩，她的豪奢超過古稀天子）。

慈禧太后究竟是女性，不如乾隆帝一樣嗜好野生物，即青蛙（乾隆朝膳檔作櫻桃肉）也未見供奉，但她講究衣飾却更勝於乾隆帝，我曾看見她親手繪製衣料花紋及色彩圖樣交江南兩織造製辦。

古稀天子的衣食

故宮文獻館已發現並經整理的御膳房檔及四執事庫「穿戴檔」等，最早的時代是清乾隆朝，還沒有看到康熙雍正兩代的。我大體綜合乾隆朝膳檔發現這位「古稀天子」對蘇州飲膳點心頗有特別嗜好，蘇州廚師張東官

尤被恩寵。他做的「豆豉炒豆腐」、「糖醋櫻桃肉」（蛙腿）尤爲帝所喜愛。我推測這一嗜好的由來，似乎不是「下江南」在當地品嚐而引起，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康熙朝以來宮中就流行蘇州膳品。這一推測是根據以下文證：（一）宮中有蘇州織造及江寧織造經常供奉蘇州膳品的奏摺，其中若干已刊佈在「文獻叢編」。我還看到宮中有更多的奏摺未及發表。這兩處織造自康熙朝以來，即由曹李兩姓擔任。曹姓是康熙帝幼年乳母家，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正是他家後裔，李姓與曹姓是姻親。這兩家人幾代擔任織造，爲皇帝製辦日常衣飾用品之餘，更經常供奉江南名產食品。（二）乾隆朝纂四庫全書時，曹寅撰「飲膳正要」也被採輯。這和御膳房特有「蘇造檔」，正是表裏輝映，相得益彰。在膳房檔冊中更有長蘆鹽政等供奉蘇州廚師或呈進蘇州茶點的記載，都是迎合乾隆帝嗜好。乾隆帝甚至壽登九十仍愛食蘇州點心，如豬油到口酥、豬油酥燒餅、豬油澄沙餡酥餃子等油脂食品，可見他的胃口至老不衰。我由這些文獻進而了解紅樓夢中再三提及「南邊來的糟小菜」意旨所在，我曾撰「故宮檔案中所見曹雪芹先世事蹟」。

二三百年來若干私人筆記中常說皇帝御膳房浮報膳食費用，如鷄蛋一枚三兩云云。意思是說當值太監以皇帝不知民間事情及物價，可以乘機浮報。就我看到膳房檔冊，事實完全不符。因一切都有規定，不容浮浪。御膳每日需用柴一五〇〇斤、炭二四〇斤、豬肉十四斤、肥鴨子一隻、肥鷄一隻、豬油一斤，新粳米三升、黃老米三升六合、大黃米小黃米各三合、高麗江米三升、白豇豆一升二合、碗豆折六合、芝蔴二合、白麵六斤二兩、粳米麵二斤、白糖一斤九兩五錢、蜂蜜三兩、香油二斤二兩、雞蛋二十個——以今看來這實在不算浮浪，燃料數量較多，是必需二十四小時準備，才能隨時侍應。膳檔又記載：乾隆帝用膳時對特別喜嗜的剩餘菜點常囑「留着晚晌用」！更是不浪費的反證。

我從膳檔中發現：乾隆帝自回回女子（即世傳「香妃」）入宮後，特別尊重她的習俗，即時常賞賜豬肉以外的菜點給她。同時，我又自四執事庫「穿戴」檔中發現乾隆帝傳旨准「香妃」仍著回回朝服。「穿戴」檔及膳檔更記載「香妃」多次隨帝赴熱河。我應用這許多文證撰成「乾隆帝與香妃」，鄭重否認世俗訛傳「香妃」

經常以劍護身以及自刎謬說。我並且看到郎世寧繪「武列行圍圖」，正描繪乾隆帝與「香妃」在熱河並轡狩獵情景。這些原始記錄證明世間流行的書籍繡壁虛構，「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又是一例證。

我自「穿戴」檔知道乾隆帝對衣飾的顏色花樣尺寸都非常講究。他的秋季常用袍前身長四尺一寸五分，後身四尺二寸五分。他傳旨：「現穿袍短些！前後身俱放一寸」。但翌年按新尺寸縫製夏季單紗袍，他又傳旨：「袍長了些，着去五分」。後來又傳旨：「袍上領子小些！到家裏着皇后放樣。巡幸掛抬肩轉身最小，也要放樣」——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帝穿油綠寧絨面黑狐肱袍，傳旨：「顏色綠些」！又傳旨：「現穿青緞面烏雲豹褂花不勻」！

四執事庫當值的都是太監，他們奉旨後記檔都用口語白話，上錄諸例可見一般。又如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裏邊總管王成傳旨：「養心後殿東暖閣現掛藕荷色春袖面月白裏白袷帳一架，旨意：怪糙舊了！總管王成隨口奏：經過年代多了。奉旨：「着另做新帳架一架！再帳子雖然舊了，他們收的也草」！這些生動的記載，是文人學士執筆的「起居注」「實錄」中絕難看到的。由於這些檔冊的留存世間，充份顯露宮庭禮儀固然嚴肅，日常生活却富於人情味。乾隆帝的確是國史上空前絕後的「古稀天子」，他的日常生活應可代表一般。當時我曾有利用這許多檔冊撰述「清代帝后衣食住行」一書，並配用有關彩色照片，作為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刊之一（預訂民國四十四年出版）。不幸時局突變，這一計劃也付之流水。

我在故宮文獻館工作不過三月，就被迫離平南下。在這一「寶山」停留時間，實在很短，幸而工作同仁熱心協助，使我事半功倍，不祇看到許多珍貴史料，解答多年疑問，更重要的是我實際認識：近代檔案也就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如是繁多，故宮「文獻叢編」等已刊佈的不過祇是經過選擇的萬分之一。這一「萬分之一」已刊佈的史料，或多或少可提供一些事實真相，但究竟難免拾人牙慧之譏。因這些都是經過文獻叢編主編人的選擇後才公開刊佈，這和研究者自己在成堆的原始檔卷中披沙揀金細心尋覓的收穫是大不相同的。從此，我對檔案館的注意更甚於圖書館。

國父倫敦蒙難檔案

早在對日抗戰以前，我在北平撰述一八六〇年慈禧奪取政權史事時，發現關係書刊中有英國擬擁恭王爲帝的記載，後來又看到清光緒朝英國支持清廷若干人物的說法，就企盼有一天能到英國去尋找有關檔卷及史料。由於這一意願，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六月，我應邀赴美國洛杉磯參加一國際學術會議，啓行以前，就決定回程時在倫敦小住，以便閱讀英國外交檔案。經過「自由中國協會」函介、英國外務部的同意，是年十月三日我就進入英國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達到多年的意願。

英國公共檔案館收藏十一世紀以來中央政府及英格蘭、威爾斯法庭文件，也保存了一七〇七年以來大不列顛、一八〇一年以至今日聯合王國的所有文件。一九五九年十月，我第一次去研讀時，他們的規定是自當年上溯五十年以前所有檔案文件都開放供公眾閱覽，也就是我當時可以借閱到一九〇九年的英國檔案。但一九七三年九月我再度去英國公共檔案館時，發現自一九七二年一月起他們已將檔案公開時限作進一步的縮短，即自「五十年以前」改作「三十年前」，並且將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檔案中重要部份都予以公開，比較「三十年前」時限還要縮短了。同時，外交檔案中的重要部份資料且已攝成顯微影片，並編製索引（*Index to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foreign office*）公開印行。研究人員如果沒有機會去倫敦，在本地圖書館也可能讀這些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購有一部份）。

很顯明的：我國故宮保藏明清兩朝檔案的最早時月，大約十七世紀初，比較英國現存最早檔案要遲四五百年。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以來，我國檔案大部份已經殘缺，甚至關係重要的外交檔冊也是如此。多年不斷的戰禍，以及人謀的不減，是形成這一現象的主因。當我在英國公共檔案館時內心實在很慚愧。

我在英國公共檔案館裏最重要的收穫，是閱讀 國父倫敦蒙難（一八九六年）的原始關係文件。

倫敦蒙難是中山先生生平第一大事，由於這一事件，他的姓名才開始爲世人所知，一八九七年，他手撰「倫敦蒙難記」英文本刊行，世人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運動，日本朝野且因爲這一冊書，而決定和中山先生交往——倫敦蒙難事件主要關鍵是：中山先生是祇一次偶然與滿清使館官吏相遇，而被誘拐入使館？還是自動兩次前往清使館，而被發現遭扣押？「倫敦蒙難記」是堅持前一說法，清吏刊行筆記却提出後一說法。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羅家倫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發現部份資料，沒有比證其他史料即撰刊「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却加強清吏的說法。但我細閱英國檔案後確知：英國內務部司法部當時即曾就中山先生自述與清使館參贊馬格里的說詞詳細比較勘證，結論是「孫先生的說法是真實的」（Having found Sun truthful on material points）。反之，馬格里所謂孫逸仙曾經兩次赴清使館的說法，就現有證據來判斷是不確實的，何況馬格里自己於此就曾有三次不同而前後矛盾的說詞。英國司法部律師又明白指陳：馬格里說孫逸仙「並未受到囚犯待遇」，一定有些遲疑不安！因爲除了沒有穿着囚犯的衣服及有食物供應以外，其餘一切監禁人犯的條件都已具備了。「假若如馬格里說，由這些事實看來，孫逸仙並未受到囚犯的待遇，那我祇好說：語言的意義，對於他和對大多數人是完全不同的」。

中山先生經英國朝野營救，重獲自由以後，英國報紙幾一致的譴責滿清使館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爲。英國外相且命令駐北京公使致照會給滿清政府：「沒有一個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內能容忍這種行爲」；「如果這種行爲重演，將證明必須利用任何可能需要的方法來釋放囚犯，並使負責此項監禁行爲的人員儘速離開」。事實真相因此更明顯確定。

滿清駐英使館在清廷命令之下，祇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違反國際公法且侵犯人權以後，又力圖掩飾錯誤，他們向清廷的一切報告，固然可說是原始文件，但內涵的真實性却經不起考驗：中山先生撰「倫敦蒙難記」刊佈於前，倫敦外交檔案又公開於後，一經相互參考稽證，清吏文件的顛倒是非掩飾錯誤的原形畢露。這是當今世界交通便利，各國檔案又提早公開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任何人胡作妄爲都是無法逃過歷史的鏡子映照。

的！

英國檔案既證明清吏的胡作妄爲，同樣的：帝俄時期檔案公開以後，一八九六年夏李鴻章在莫斯科商談中俄密約及中東鐵路建築合同時，他的兒子李經方接受俄人賄金，一八九八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時送賄金給清廷大臣張蔭桓等等醜事也都揭露。但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一八五八年璦琿條約、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條約等談判詳細記錄却迄今沒有公開。

日本外交軍事檔案已被攝影公開

自日本無條件投降，盟軍占領扶桑三島，美國務院與國會圖書館爲使世人認識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經過，特將日本外務省及軍部檔案製成顯微影片，供各國學人研究，並刊行目錄二冊，便利檢查：①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868-1945*。② *Checklist of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8-1945*。

一九六〇年夏，我重遊日本，居留二月有半，研讀上述這些原始檔案是主要目的，因爲閱讀顯微影片頗費目力，且臺灣沒有購藏，既到達東京，自然以檢閱原件爲佳；同時，我更希望了解是否還有未經攝製影片的檔案——當我在東京霞關外務省新廈與其文書課負責人會談後，我慶幸不虛此行：上述「目錄①」「原注」「遺失」(Missing)各檔今已發現若干，其中有「目錄①」第九頁註明遺失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 (革命黨關係)：一八九七——一九〇〇年」三卷，我急申請調閱。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活動因此獲得原始記錄了。

中山先生自倫敦出險，並在大英博物院圖書室閱讀約九個月後，一八九七年七月乘輪離英經加拿大東歸，八月十六日到達日本橫濱。日本外務省從此才有關於中國革命黨活動的專檔。其中一九〇〇年部份特別重要，

因當時中國正有義和團之亂，中山先生奔走各地，力圖保全民族元氣。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自新加坡經西貢到香港。原有與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在香港會晤的意圖。香港總督且擬不顧五年不准孫登陸的禁令讓孫李相聚，但被英國首相否決。因此，十七日，李鴻章自廣州乘輪到香港時，孫因處輪舟不能上岸。十八日，李離港北上，二十日，孫乘輪赴日本——這幾天的事實，是參閱英國和日本外交檔案才知曉的，中山先生自述和中英日文已刊書刊都沒有記載。由這一事例可知原始檔案在史學研究上的價值遠超過一般圖書，而也具體證明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必須參閱外國檔案。事實上：不祇上述這一事例，即中山先生初次蒞臨臺灣時日，如果沒有日本外交檔案的記載，也就人云亦云莫衷一是。例如黃純青說約在一九〇〇年九月，黃啓瑞則確言是一九〇〇年九月二日。但我根據上述日本外交檔案才確知中山先生初次蒞臨臺灣是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神戶乘輪到基隆旋即轉往臺北。這次來臺目的在策應惠川起義行動，不幸日本政局變化，原來計劃不能實行。是年十一月十日中山先生因變名「吳仲」自基隆赴日本。

中山先生在來臺灣以前曾有上海之行，原計配合自立軍行動，也不幸失敗。是年九月一日離上海赴日本，在船上發現自立國會會長容閔也同舟共濟，兩人聚談甚久。這一發現使我幾年以後在美國閱讀容閔史料時，有更多了解。

我在日本防衛廳研修所戰史室閱讀的史料，一部份是戰時原始檔卷，一部份是戰後有關作戰人員手寫回想錄等。日本軍部許多檔案在戰敗投降後多已焚燬，「戰史室」收存原始檔件不多的原因在此。這裏不能說是日本軍部檔案館，但我能進入其中閱讀——並且是中國學人到這裏來閱讀的第一人，加以幾位日本軍官知悉我曾在湖南戰區擔任編集戰史工作，都會和我討論對證雙方見聞，這些心得對我撰述「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很有幫助。

日本本土外交軍事檔案既被盟軍攝影，原被日本統治的韓國文獻也隨着國土重光而公開。一九六〇年夏，

我曾在漢城閱讀過，當時是收藏在京城國立大學中央圖書館中，歷時數百年的「奎章閣」橫匾也仍存在。在這些資料中有十九世紀末葉「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與各國來往文件原檔，例如其中與中國往返文書起自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八月。另有「日信」「英信」「俄信」「美信」等。可惜祇有少數是光緒二十年四月以後的，各冊文號頁碼不相連貫，時間自然也不相銜接，這是什麼原因無法確知。又大韓民國國史館保存有「駐韓日本公使館紀錄」（一八九四至一九一〇年）照片，是日本投降以前，韓籍職員申奭鎬冒險秘密收藏的。其中有日人與袁世凱往返書信若干。這兩宗重要檔案是研究甲午戰爭以前袁世凱在韓言行的原始記錄，非常珍貴，是中英文有關袁世凱書籍從來不知的新資料。

美國國家檔案館便利學人研究

美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雄偉的建築、豐富的收藏，和美國會圖書館相互對峙，是訪美學人常遊之地。兩者性質儘管不同：檔案館保存美國獨立建國以來的一切原始文獻檔案，圖書館網羅全球官私出版品；但兩者都是美國人甚至全世界的知識寶庫却毫無疑問。

美國國家檔案館正廳陳列二百年前獨立運動的若干原始文件，並有壁畫顯示當時會議及戰爭情景，任何人都可進入參觀。如果要閱讀某些檔案就需要申請一張「研究人員識別證」(Researches Identification)。但手續很簡便，美國人祇須出示任何身份識別證，外國人出示護照，填具一份申請書寫明調閱檔案類別，不到一分鐘就可拿到識別證進入研究室。這比較英國公共檔案館發給閱覽證 (Reader's Ticket) 需要學術機關、大學或大使館正式介紹信大不相同，也就是簡便多多。但不論美英發給的識別證或閱覽證都不需貼相片，至於證卡使用時間：美國國家檔案館是一年，英公共檔案局是三年，到期後如繼續需要研讀，憑舊證即可換發新證。一九七三年九月，我持英國公共檔案局一九五九年九月發給早已逾時效的閱覽證前往換發新證，手續簡便，祇

按舊證上姓名填寫在新證上，並有「有效期限」欄蓋上「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戳，就升堂入室了。這比較臺灣僅有的一二史料庫主持人不知世界大勢：有關各國檔案都已開放，我國「抱殘守缺」，不讓學人研究，惟有自食「歷史上缺席裁判」的惡果——十餘年來，我曾多次撰文提出這一問題，當局者始終不注意，如今殘酷事實已很顯明了。

美國國家檔案館職員對外來研究人員的熱誠協助，尤使人感動。我為了解中山先生幾次訪美行蹤，調閱有關檔卷，大約不到二十分鐘，兩位職員即推來二層書架輪車的資料，都是關係一八九〇年以後中國人進入美國的。我檢閱後發現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資料，服務人員就為我用電話詢問各部門，結果要我親自入庫去查尋。因此我得有機會看到美國檔案庫隨時演進的情況，例如當今檔案館圖書館目錄卡片櫃都是容納一張卡片，但在這檔案庫內有一種相當五層衣櫃那樣大小的置放卡片的抽屜，女職員告訴我：這是若干年前的式樣。

我知曉中山先生慣用的英文簽名是 Sun Yat-sen，但若干英文書仍按姓氏放在最後排列，美國檔案館內就有幾張卡片是如此，但為數不多，我懷疑有關中山先生文件不應如是之少，猜想可能是編目人將 Sen 看作姓氏了。在檔案庫檢查果然在 Sen 發現一些有關卡片，這自然是不同時期不同編目人員而產生的歧異。而我所以有此靈機轉動是由於下述一教訓：胡適博士的常用英文署名也是 Hu Shih。有一次他自美國回臺北時為著不打擾友好去迎接，在訂購飛機票時就按洋人習慣寫作 Shih Hu，旅客名單自然也是如此。但若干友好及新聞記者自有關方面打聽到這一行程，屆時都前往機場候駕。但一看旅客名單卻沒有「胡適」祇有「石虎」！大家都不免猶疑。而不久胡先生却笑嘻嘻的走出來了——後來，我在謁見胡先生談史學方法時，偶然談到這件事，胡先生說：我們的頭腦過份僵化了！尋找事實真相、認識事實演變，應該從多方面去觀察，作各種不同的推測，不能硬抱着過去的習慣喲！

美國國家檔案館整理編排中美關係文件的分類法也隨時在改進，對一八四三年至一九〇六年資料，按「機關」區分編列，例如「駐華公使館對國務院報告」、「國務院對駐華使館指示」，駐中國各地領事館報告又分

廈門領館（一八四四年至一九〇六年）、上海領館（一八四七年至一九〇六年）等。而南京領館（一九〇二—一四）、瀋陽領館（一九〇四—一六）至二十世紀初才有報告存檔。

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四日，美國務院開始採取以事件主題（Subject）為分類標準，原檔在一定時期移交國家檔案館後，自然也跟着改變分類方法了。

美國國家檔案館已將許多檔案攝製顯微影片，供給各地研究學人，例如「國務院有關中美政治關係檔案：1910—1929」、「國務院有關中國與他國關係檔案：1910—1929」、「國務院有關中國內政檔案：1910—1929」。

事實上：美國國家檔案館已公開的檔案時限，早已超過上述各例的「卅年代」，即美國務院刊行的中美外交關係文獻也已刊佈至一九四七年。顯微影片包含時限之所以落後，可能是要攝製的文件太多，不能專注於中美關係，何況有志研究中美關係人士可以到檔案館去閱讀原檔。甚至特殊事件急需了解背景，更可允許有地位的學人利用最近五年的檔案以便撰成專書行世。

一年以來，「書評書目」月刊有幾篇討論「版權」問題的文章，很引起我的興趣，因我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曾看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美駐華公使館上國務院報告，陳述商務印書館翻印美國出版歐美歷史書籍，並剪陳商務印書館刊登的廣告，但美國要求保護版權的要求並沒有成功。中國政府根據一九〇三年中美商約第十一條規定：中國同意保護「凡專備為中國人民所用之書籍地圖印件在中國境內專利權十年（自註冊之日為始），一律不准照樣翻印外，其餘均不得享此版權之利益」。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務印書館譯印「漢英雙解韋氏大學字典」，被美國書商在上海租界會審公堂提出訴訟，也沒有成功。商務印書館的辯護律師說：美國自獨立建國起，至一八九一年對於外人版權，並未加以保護，英國也是一八八六年才開始保護外人版權。日本在一八九九年加入萬國版權同盟，一九〇六年，日本與美國締結保護著作權條約。可見任何國家在著作不多，工商業不發達的時期都不與外國訂立保護著作權的條約。

近十餘年，臺灣書商翻印美國書籍唱片更變本加厲，許多翻印書且出口往美國，嚴重損害美國著作人權益，引起美國國會的責難，甚至影響美國援華問題，因此才有臺灣影印西文書不准出口的規定。可見這一有關美國書籍版權的交涉，始終是中美兩國間一項尚未解決的問題。而臺灣書商仍舊可以逍遙自在大獲利益，甚至更進一步翻印本國出版書籍，這就顯然違法了。

美國國家檔案館曾印行若干最具歷史性的文獻，以供一般參觀者的購藏。一九四五年德國日本先後簽署的無條件投降文件即其中之一。

上面說過日本外交軍部檔案都被美國攝影公開，這是當時由美軍代表盟國占領東瀛，事權統一，不像德國甚至柏林分別被美英蘇俄三國軍隊占領，德國政府的檔案也因此被三國分別占有運回華府倫敦莫斯科，並擇要英譯刊行，拙撰「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就曾運用這些英譯德國文檔。

我曾在新加坡任教三年，當地國家圖書館收藏有英國統治星馬的海峽殖民地政府檔案，我曾閱讀若干，發現有關中山先生的史料，也看到英國人爲撲滅瘧疾等病害，研究各地蚊蟲，其中有關臺灣蚊蟲四百餘種的報告，很引起我的興趣。同時，新加坡政府爲便利處理勞工問題，特許一位美國學人研讀最近檔案，正如美國檔案館一樣。可見當今之世，無論大國小邦不僅注重保存檔案，更充分提供研究機會給學人，使他們能發揮「由了解過去以認識現在」的精神，促進自己國家以及人類文化的進步。

看過若干有關國家檔案館的內容、管理方法、服務態度以後，對於自己國內一二史料庫「抱殘守缺」「深固閉藏」「拒人千里之外」的腐化作風對國家的惡劣影響，實在憂心忡忡。